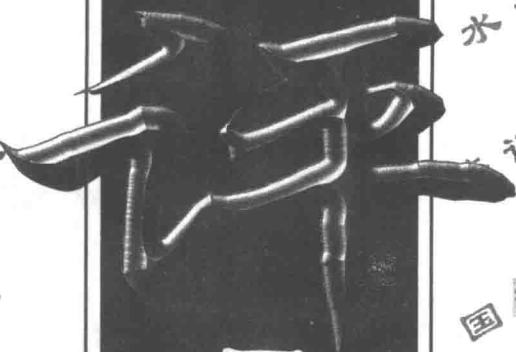


毛泽东鲁迅



四部古典名著

天津

江

11075/25

序

木 弓

这是一套关于名人与名著的书。

什么是名著？名著不是自封的，不是谁想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名著，就可以成为名著的。名著也不是赶时髦，火爆一时的作品。一个时期以来，确实有些书一上市就非常抢手，但几年（甚至用不了几年）以后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曾热闹过的书，早已是冷落尘封，无人问津了。名著是经过历代群众的检验，从多如沙石的书籍中挑选出来的真金；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卓然独存，至今仍活在人们手头眼底口边心上的艺术精品。人们把这些作品谓之经典。这些作品博大精深，地负海涵，内容之丰富厚重，是一般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对于这些名著，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开卷有益。固然，不同的读者对待这些名著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必然的。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可以考订作者的生平家世、成书过程、流传版本、人物原型以及种种有关问题，可以探讨其思想旨归、艺术成败，确定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等。一些人阅读它们可能是为了提高修养、获取知识……。更多的人阅读它们则是为了休闲，也可以说是为了消遣娱乐。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亚里斯多德说过：“游戏正是为了使勤劳的人得以休息。”不仅仅是孩子们需要游戏娱乐，成年人也同样需要。而人类永不厌倦的兴趣就是读书。一天劳作之余，一卷在手，是对生活的审视，也是对生活的美化，是为生活增添姿彩。在休闲娱乐中，自觉不自觉地

认识着生活，也改造着我们的生活。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论集》里收有一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文中对研究与鉴赏之区别，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他随意的逛过，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园，观赏名花的，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性质，与开花结果的时期与形态。鉴赏者是一个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来，是为了自己的舒适，他见一块悬岩，他见一块奇石，他见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心的赞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研究者却是一个地质学家，他要的是：考察出这山的地形，这山的构成，这岩这石的类属与分析，这地层的年代等等。……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

虽然如此，二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不但鉴赏者因了研究者的成果，可以对作品认识得更深更细，把握得更准确；研究者也可以从鉴赏者那里汲取零金碎锦真知灼见，从而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二者虽有差别，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为这些名著内涵深广，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会和认识。这也是正常的现象。《维摩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处各得解。”鲁迅先生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说过一段名言：“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作家观察社会人生，因作者不同而不同；读者读书，即观察作家用文字描绘出来的社会人生，又因读者的不同而不同。这不仅是因为读者的生活经历、人生经验的差异，知识修养、欣赏水平的差异，更因为“形象大于思想”，这些伟大作品具有很强的感觉暗示性，因而使其描写中所蕴涵的丰富性，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意旨，具备了“说不尽”的无限性，所以人们说：“有一千

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可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诸葛亮、关羽、张飞、宋江、武松、鲁智深、孙悟空、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些名著是“说不尽”的。晚清谭献在《谭评词辨》中说:“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读者在鉴赏时有理解的自由,甚至可以与作者的本意不相吻合。但这仅仅限于鉴赏、借题发挥式的应用,而不适用于对作品的研究与解释。

不论持何种态度、有何种认识,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被作家所塑造的生动艺术形象,被那些惊天地泣鬼神、能令人哭能令人笑的生动艺术描写所感动,在感动中完成新的洗礼,我们在品评书中人物的时候,也同时重新塑造着我们自己,实际上,每阅读一次这些名著,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新人,只是这种“新”因素的增长,是在潜滋暗长中实现的,是在我们难以察觉中渐变暗转的,然而又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发生着的。

这些名著是民族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高雅的象征,但它们却不应当仅仅是摆放在居室里的装饰品,它们应当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它们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了解人生,提高口头及文字的表达能力,可以说这些名著是提高我们民族素质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部书里所收的,既有鉴赏(包括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里所说的“断章取义则是”的读书联想和具体应用),又有研究性文字。对这些名作进行鉴赏与研究的,又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品鉴与研究,来认识和领会这些名著,也可以受他们的启发产生自己更独到的感悟和实际应用。这是名人与名作的连璧之作,读者是自能领会的。天津古籍出版社曾出版过这些名著的单行本,前言为张燕瑾先生所写。我们征得了张先生的同意,此次《毛泽东鲁迅评四部古典名著》本各书之前言,仍用张先生旧作,特此声明并向张燕瑾先生致谢。

毛
泽
东
鲁
迅
评
《
水
滸
传
》

毛泽东评《水浒传》

《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

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批评红军中的某些领导干部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而造成鲁莽处事时如是说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22页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如是说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林冲棒打洪教头为例来阐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时如是说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及运用唯物辩证法时如是说

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

——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贺龙和徐海东如是说

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传》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谈到说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问题时如是说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记。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的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实际。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统一战线问题论及要善于采取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策略时如是说

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

——1945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城市工作时如是说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对付国内外反动派“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时如是说

我们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如是说

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个戏。※

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

——1959年2月毛泽东在省市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醒全党必须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时如是说。

※“还编了个戏,”系指平剧《三打祝家庄》。1942年10月,毛泽东曾提议成立不久的延安平剧院根据他在《矛盾论》里关于《水浒传》,“三打祝家庄”故事的析述创作一个剧本。1944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剧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到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曾指示说:第一,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后来该剧公演,毛泽东在贺信中称它“很有教育意义”。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按:应为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

——毛泽东在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借梁山好汉劫持“生辰纲”的故事,批评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现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倾向时如是说(见《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水浒传》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谈话时如是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的好，他说：“一部《水浒》说的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对在他身边陪读的同志如是说

《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他三遍，不要去注意那种演义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毛泽东在谈到做一个中国人不能不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名著时如是说

鲁迅评《水浒传》

《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宋江亦实有其人。《宋史》(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降后之事，则史无文，而稗史乃云“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见十三篇)。然擒方腊者盖韩世忠(《宋史》本传)，于宋江辈无与，惟《侯蒙传》(《宋史》三百五十一)又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似即稗史所本。顾当时虽有此议，而实未行，江等且竟见杀。洪迈《夷坚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郢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郢时，有梁山泺贼五百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然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宋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自序已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今高李所作虽散失，然足见宋末已有传写之书。《宣和遗事》由钞撮旧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泺聚义始末，或亦为当时所传写者之一种，其节目如下：

杨志等押花石纲阻雪违限 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 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 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 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 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 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 宋江奔梁山冻寻晁盖 宋江三十六将共反 宋江朝东岳赛还心愿 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 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惟《宣和遗事》所载，与龚圣与赞已颇不同：赞之三十六人中有宋江在外，而《遗事》之吴加亮李进义李海阮进关必胜王雄张青张岑，赞则作吴学究卢进义李俊阮小二关胜杨雄张清张横；诨名亦偶异。又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而陈泰（茶陵人，元延祐乙卯进士）记所闻于篙师者，则云“宋之为人勇悍狂侠”（《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与他书又正反。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

原本《水浒传》今不可得，周亮工（《书影》一）云“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所削者盖即“灯花婆婆等事”（《水浒传全书》发凡），本亦宋人单篇词话（《也是园书目》十），而罗氏袭用之，其他不可考。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于是智深坐化于六和，宋江服毒而自尽，累显灵应，终为神明。惟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其记林冲以忤高俅断配沧州，看守大军草场，于大雪中出危屋觅酒云：

……却说林冲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坏了，自思曰，“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来修理。”在土炕边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说（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出来，信步投东，不上半里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拜曰，“愿神明保佑，改日来烧纸。”却又行一里，见一簇店家，林冲径到店里。店家曰，“客人那里来？”林冲曰，“你不认得这个葫芦？”店家曰，“这是草场老军的。既是大哥来此，请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风之礼。”林冲吃了一回，却买一腿牛肉，一葫芦酒，把花枪挑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场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庇护忠臣义士，这场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倒了。……（第九回《豹子头刺陆谦富安》）

又有一百五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适文存》三）。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回及宝历九年（一七五九）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亦始于误走妖魔而继以鲁达林冲事迹，与百十五回本同；第五回于鲁达有“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证果江南第一州”之语，即指六和坐化故事，则结束当亦无异。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节，即多于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余：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

思“却才老军所说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迤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护，改日来烧钱纸。”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如何？便认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依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紧了。古时有个书生，做了一个词，单题那贫苦的恨雪：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拈絮搴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道是“压瘴尤嫌少”，向的是兽炭红炉，穿的是棉衣絮袄，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杨定见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次发凡十条；次为《宣和遗事》中之梁山泝本末及百八人籍贯出身。全书自首至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辽小异，且少诗词，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而收方腊又悉同。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

特于字句稍有更定，如百回本中“林冲道，‘如何？便认的。’”此则作“林冲道，‘原来如此’。”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入，故发凡云，“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颇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撙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也。亦有李贽评，与百回本不同，而两皆龕陋，盖即叶昼辈所伪托（详见《书影》一）。

发凡又云“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是知《水浒》有古本百回，当时“既不可复见”；又有旧本，似百二十回，中有“四大寇”，盖谓王田方及宋江，即柴进见于白屏风上御书者（见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及《水浒全书》七十二回）。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辽国，成百回；《水浒全书》又增王田，仍存辽国，复为百廿回，而宋江乃始退居于四寇之外。然《宣和遗事》所谓“三路之寇”者，实指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强人，皆宋江属，不知何人误读，遂以王庆田虎辈当之。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纷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七回本名同而文迥别，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后讨平方腊，则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据旧本之前，当又有别本，即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于事理始为密合，然而证信尚缺，未能定也。

总上五本观之，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云，“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既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应麟所见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

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明高儒《百川书志》六），且是其师。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亦信所见《水浒传》小序，谓耐庵“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且云“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余》”，而《志余》中实无有，盖误记也。近吴梅著《顾曲麈谈》，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案惠亦杭州人，然其为耐庵居士，则不知本于何书，故亦未可轻信矣。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终，而指招安以下为罗贯中续成，斥曰“恶札”。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右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周亮工（《书影》）记《水浒传》云，“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二人生同时，其说当可信。惟字句亦小有佳处，如第五回叙鲁智深诘责瓦官寺僧一节云：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盂。”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只被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将钱养女，长老禁约他们不得，又把长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来都废了。……”

圣叹于“听小僧……”下注云“其语未毕”，于“……说”下又多所申释，而终以“章法奇绝从古未有”誉之，疑此等“奇绝”，正圣叹所为，其批改《西厢记》亦如此。此文在百回本，为“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

说。’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广有，僧众极多……’”云云，在百十五回本，则并无智深睁眼之文，但云“那和尚曰，‘师兄听小僧说：在先敝寺，田庄广有，僧众也多……’”而已。

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故至清，则世异情迁，遂复有以为“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者，截取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至结末，称《后水浒》，一名《荡平四大寇传》，附刊七十回之后以行矣。其卷首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赏心居士序。

清初，有《后水浒传》四十回，云是“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盖以续百回本。其书言宋江既死，余人尚为宋御金，然无功，李俊遂率众浮海，王于暹罗，结末颇似杜光庭之《虬髯传》。古宋遗民者，本书卷首《论略》云“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然实乃陈忱之托名；忱字遐心，浙江乌程人，生平著作并佚，惟此书存，为明末遗民(《两浙辖轩录》补遗一《光绪嘉兴府志》五十三)，故虽游戏之作，亦见避地之意矣。然至道光中，有山阴俞万春作《结水浒传》七十回，结子一回，亦名《荡寇志》，则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专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以结七十回本。俞万春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尝随其父宦粤。瑶民之变，从征有功议叙，后行医于杭州，晚年乃奉道释，道光己酉(一八四九)卒。《荡寇志》之作，始于丙戌而迄于丁未，首尾凡二十二年，“未遑修饰而歿”，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其子龙光始修润而刻之(本书识语)。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
(下)》